

中国现代 企业制度研究

● 主编 郑天伦 陶一桃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 SHE

序



3 0087 8825 3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16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任务就迫切地摆在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相辅相成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制度的现代化,现代企业制度也必然要求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与之相适应。因此,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就是深化改革,落实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经济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发展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探索,全国各地都在积极进行。我国各个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示范区”、“辐射地”、“带动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深圳经济特区已确定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验。如何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并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分析和概括,是我国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重大历史责任。对此,我国许多学者、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已经发表了许多有益的意見、设想和看法,并就各种不同的意見展开热烈讨论,为了总结、交流各地企业改革的经验和研究企



C

453536

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活跃思想,推进研究,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发起举行了“'95中国深圳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深圳大学连同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科中心、深圳市委党校、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共同主办,得到了国内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大力支持,被认为是一次全国性、高层次、大规模的研讨会。著名学者于光远、杨启先和青年专家樊纲、魏杰等出席并作了学术报告,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邓鸿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来自各地和深圳本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的负责人参加了讨论,宣读了论文,交流了经验。会议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理论、深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难点,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具体模式充分交流了意见。到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一致认为,这些讨论是适时的、有益的,将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把这次会议的成果更好地介绍给广大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企业界人士,进一步推进对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模式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们把这次研讨会的主要报告和论文汇编成册。全书分“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深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经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社会环境”三个部分,共43篇。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由于时间比较紧迫,难免出现疏漏和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郑天伦

1995年11月

于深圳大学

目 录

序.....	(1)
绪言.....	(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

关于“社会所有”	于光远(13)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邓鸿勋(18)
越南、东欧、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状况及比较	杨启先(24)
谈谈产权制度	樊 纲(36)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六个问题	魏 杰(44)
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	
——深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巡礼	苏东斌(52)
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	
——从清产核资入手,界定产权,缩小摊子,少办, 办好	熊映梧(64)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断想	陈开国(74)
营造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财产基础	
——庄志毅博士访谈录	丁立连(77)
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政府企业管理体制	施佑生(82)
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思考	张益俊(92)

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	饶会林(97)
国有企业法人化改造的难点	唐宗焜(101)
“产权明晰”的难题求解	罗 鸿(109)
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体系	杨中新(115)
中国产权制度的权宜选择	袁易明(127)
我国企业产权交易的难点与对策	彭 炎(138)
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兼论国有产权代表多元化	宋智一(149)
现代企业制度与产权界定	申 勇(160)
论授权经营中的受托责任	朱建军(166)
从体制和制度这一根本环节入手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	
与监督机制	董亚平 王 林(171)
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要求与我国企业制度的战略	
选择	黄汉平(185)
企业国有资产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	黄 龙(192)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强化企业管理	刘新良(199)
公有制的再认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权制度的重建	黄焕群(206)

深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经验

具有多元产权和产业结构的集团企业管理	陈涌庆(219)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探索与实践	张 宝(238)
授权经营	
——特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举措	王晓敏(248)
深圳企业改革的一颗新星	
——从中国企业改革的历程看	

深圳市建设(集团)公司的发展·····	汪 明(258)
市县社会公有企业的改革与管理·····	高伟梧(265)
走出区属企业公司化改组的误区	
——区属企业公司化改组调查后的	
思考·····	黄华东 王仕生(270)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社会环境

论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金融因素·····	曹龙骢(285)
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与现代企业制度·····	杨中新(299)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	陶一桃(31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政治体制改革·····	王培元(324)
政府社会经济职能与企业转制·····	骆浪萍(333)
造就职业企业家是搞活企业的关键·····	黄汉清(346)
我的成功观·····	吴谢岗(358)
要重视企业家队伍建设·····	王 哲(360)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要求·····	曾宇清(364)
公平——也制约着现代企业制度的生命·····	秦光涛(370)
深圳与熊本劳动关系问题的比较·····	钟善余 陈灼华(37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张益俊(384)
企业党建的调查与思考	
——来自福田区属企业的报告·····	熊家友(390)

绪 言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须同时解决两大经济问题,即明确产权关系和创造竞争环境。如果忽视了后者,当然是再好的体制也无法运行;而忽视了前者,则根本就不会具备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与前提。这个观点是在“'95 中国深圳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上所取得的共识。

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大学、深圳特区报、市投资管理公司、市社科中心、市委党校六家单位联合发起的这个研讨会,邀请了北京、东北、华东、华南等地的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百余人,近日聚集在深圳大学,进行了六个单元充分而热烈的研讨与争鸣。在这近一年来国内少见的高层次学术会议上,集中探求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难点与对策。因故不能亲临会场的若干专家学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向大会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

明确产权关系

针对旧体制在产权关系上的弊端,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精辟地分析道:传统的国有制形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人类两大经济问题——公平与效率。我们虽然消灭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却出现了如陈云所说的另一种剥削,即劳动少、贡献小的剥削劳动多、贡献大的平均主义分

配制度。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上是全民全社会所有，却仍然分割成部门、地区所有，照样没有实现社会化。所以旧体制既调动不起来大家的积极性，又造成盲目生产与重复建设，并未真正体现人民的财产主体地位。

近年来一直论战在学术前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樊纲从为什么多年来能干的企业家往往选不中，选中了也常常被同化；为什么在全世界都行之有效的利率杠杆在中国却失灵；为什么有的企业产值上升了，利润反而下降了；为什么喊了多年的政企分开却总是无法分开等一系列问题出发论证了“缺乏关心资本效率的所有者”是最重要的制度缺陷，说明了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企业管理得以根本改善的制度前提。

资深经济学家高尚全在提交的论文中鲜明地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应着眼于整个国有经济，着眼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应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考虑，不是着眼于每个企业。国有企业不可能都搞好，必须有一部分搞死，搞不死的话也活不起来，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80 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应邀在会上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他从翻译工作与学术进展两个角度反复说明了在马克思那里是严格区分“公有”和“社会所有”两个词的。他坚持主张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同时认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并不能称为“私人”。他的讲演给大家以深刻的理论启迪。

多年来致力于企业改革的周叔莲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强调：从一定意义上讲，产权明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并认为，产权改革的要求就是在坚持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承认企业有法人所有权，而这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营权。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在接受大会电话采访时强调：私有化

并不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前中国正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加速国有企业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他具体指出,股份制是一种按份额共有的财产组织形式,把出售小型国有企业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国有资本的再投入只会增强国有资产的实力。

深圳大学郑天伦教授在论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制的主导作用之后,说明了这个结论只能体现在社会总资产的优势比重、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握程度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导向上,决不指每个地区的数量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提交的论文中具体地设想了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国有制形式多样化的主张。如提出“社会保障基金股”以及中央和地方分级所有等政策措施。

深圳市社科中心主任彭立勋教授从几个层面论证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基础,而明确产权关系则是创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这一命题。

创造竞争环境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央决定所指出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所以它必然涉及到政府行为、领导体制、伦理文化、思想观念等一系列领域。

北京大学李庆云教授指出了实现产权明晰的两大任务:对政府来说,如何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要求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来说,则要寻求在企业内部造就国有资产合格的代表者的科学形式。

《开放导报》副主编陈开国对此分析到,如果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设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最重要

的事情并不在于企业形式与名称的花样翻新,也不在于国有企业产权在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认定与分割,而且企业内部管理上的事情也不是可以同企业制度改革相提并论的问题。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在于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独立运行的内在要求,在经济上、法律上创造必要的环境与条件。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现代企业制度自然就会确立起来。

至于什么是这个问题的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尖锐而鲜明地指出:传统的计划经济本质与要害是政府统一组织社会生产,直接管理企业。两者是统一的,一个是出发点,一个是落实处。简言之:政企不分。正是这个本质与要害决定必然需要的计划及指标体系,决定必然需要的行政贯彻体系,也决定了必然的结果是国营企业没有现代企业的活力。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政企分开”!

虽然与会代表都十分赞同“政企不分”已构成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根本性障碍,但是对于其形成原因,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深圳大学苏东斌教授分析说:“政企不分”既不是国有企业体制上的弊端,也不是政府管理工作上的失误,而是国有企业内在属性与基本特征。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不是一味地“放权”,使其走向独立,而应首先去调整所有制结构,尽量把竞争性行业转入社会多元投资主体。国家在把工作重点定位于抓好特大型企业集团的同时,也应对公益性、垄断性、非盈利性国有企业加强产权约束与监督。樊纲说明了国有企业的财产权本身就需要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来参与企业的各项重大事务,政企根本不可能分开,所以“资产重组”才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博士在提交的论文中分析了政府代理和剩余索取权的非转让性是国有企业产权的两大根本属性,政府的社会目标始终存在,以及在政府难以使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资产增值条件下,指望“政企分

开”是不现实的。所以关键的途径是在非竞争领域进行非市场化，而把大量竞争性产品引向多元化投资，进行真正的市场交易。

中国人民大学魏杰教授以他惯有的坦诚分析了国有企业定性定位的三大条件，即非竞争性行业、社会管理能力、社会文明基础。为此应大力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进程以壮大国民经济的实力，这样做有利于把国有企业引向竞争。国家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全体纳税人。苏东斌教授就此补充说，在经济工作中应以国家整体的“利益综合法”来代替阶级观念的“所有制分析法”，应树立“税收高于利润”的现代经济意识。

主持新成立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力排众议，从“制度适应性”出发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国有企业问题症结不在于放权让利，也不在于产权明晰，所有权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在于不平等竞争条件下形成的预算软约束，因此，企业改革的核心应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利润就不会反映经营的好坏，所有者监督经营者的成本就会更高，经营权侵犯所有权就将不可避免。所以国企改革应先滤清社会信息。他的同事张维迎教授则在提交的论文中予以直接反驳。他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安排的重要性，并认为，从静态看，所有权是必要条件；从动态看，所有权是充分条件，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下手处应是由谁选择老板。据此，他又提出把国家资产变成债权而不是股权的主张，并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竞争将失去基础。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在接受会议采访时强调，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国家所有权管理方法上的改革。他认为，产权问题说到底还是管理问题，任何国家不可能由总统、总理直接干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国家只能提出大政方针，提出总的目标，而后通过一定的方式、一定的手段、一定的机构和机制去贯彻落实。谈到“党委

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企业领导体制，乌杰说，这种党委书记、领导、厂长负责的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够科学的，由此造成了书记、厂长关系一直不顺，政出多头。在实践中，谁领导就应谁负责，有了成绩是我领导有方，出了毛病证明我无能。谈到建造科学的用人机制时他说，王安电脑公司曾是美国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仅仅是因为王安安排了自己儿子接班，结果王安去世后不久，公司就垮了。所以企业能不能经营好，不在于是不是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结构，关键在于是不是有一个懂得科学管理者的领导班子。

深圳大学的女博士陶一桃副教授赞同企业文化是深层次的管理，同时强调儒学伦理中“唯政以德，修身为本”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价值观念既是内在的自觉行动，又是同管理行为外在约束相统一的。把儒学中的精华运用于现代管理之中，已经得到当今世界广泛的认同。

就管理问题，洪虎代表个人发表了重要意见，提醒人们千万不能用管理替代改革。他在电话里指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清理一个认识误区，即用管理部分或全部替代改革。要区分企业管理与企业改革两者之间的不同，两者不能相互代替，当然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有企业就有管理，而体制上的变化才是改革的内容。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是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是财产关系。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与企业法人的财产关系，即产权关系。二是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与企业作为被管理者的关系。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是对全社会的，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都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三是分配关系。利润是政府用国有资产投资获得的回报，而税收是政府凭借政权强制参与企业的分配。在政府与企业的三大关系中，核心是产权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吴晓灵主任在提交的论文中再次提出，在财政、企业、银行之间进行债务重组。其具体办法是由财政向人民银行举

债,解决国有企业的非正常负债。认为作为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所有者,这些债务原本应当由财政承担。当然这只是计划经济大锅饭的“最后的晚餐”,不会有第二次。深圳大学的曹龙琪教授就如何建立企业制度与金融因素的双向制约机制和连动机制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赞同变不良贷款为银行对企业的投资,或者说国家将一部分无法收回的债权变成银行对企业的投资,作为银行在企业中的股份。但他强调专业银行商业化趋势。

青年学者王培元分析了现存的中国政治体制、法律与制衡机制以及行政体制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的不适应性与矛盾性,认为这一领域的改革滞后已经使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踏上了艰难的历程,因此,应按邓小平理论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他提出了地方政府官员由民选推举,以及通过民主程序来产生向公众负责的公有制企业代表等具体设想。

深圳金田实业集团董事长黄汉青、市委党校曾宇清就职业企业家的形成,香港超顺集团总裁吴谢冈就“诚信”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南油市政建设公司总经理张益俊就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和市委党校王桂德教授就企业领导体制、分配制度分别发表了学术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家骏也就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交了论文,主张目前中国不宜要求保持过高的替代率(即60%以上)。

归结改革的环境问题,樊纲在分析了世界经济改革的实践后,提出决定改革特点与途径的四大因素:利益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信息程度、传统影响。

推动改革进程

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倪元谔、深圳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

黑虎、市建设集团总经理张宝、市石化集团总经理陈涌庆分别以不同的形式介绍了深圳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实践之后，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了深圳的经验，普遍认为深圳创造的“三级授权经营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由于它找到了国有资产的代表人物，所以能够在全国率先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它属于制度创新性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鸿勋在肯定了深圳在产权界定中先走了一步的经验之后，希望深圳不仅在政企分开，而且在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核心与中心的关系、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等方面继续向前大胆探索。

杨启先教授介绍的外国改革进程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如越南政府强制所有的国有企业重新登记，使40%企业因亏损而自然淘汰；韩国政府把国有企业控制在基干部门，通过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钢铁原料的生产，为广大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与环境。香港物业集团中方副总经理施佑生在提出必须建立“谁的钱谁管理”的体制之后，介绍了香港的经验，即在香港不管是私人企业，还是有限公司，或者是公众公司，几乎与政府不发生任何直接的关系。香港的企业经理不认识政府官员，不用到任何政府部门去办理与企业有关的事务，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到企业来检查指导工作。政府与企业之间只是税收关系。即使税收，政府也不直接与企业发生关系，而是通过会计师事务所代为申报和咨询。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基本上是通过中介机构实现的。

樊纲提醒与会者应高度重视各国、各地区的改革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尤其不应忽略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因为没有今天，就不能有明天，未来的发展有时与人们的预期设想未必完全相同。

市委宣传部调研员沈元章就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正是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才给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创

造了时间和空间，离开人民利益和幸福的任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不正确的。深圳的 15 年发展不仅建设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而且也提供了无限的精神财富。这次盛会表明，深圳决不是一个学术空气淡漠的天地。

不管在研讨会上学术观点的分歧有多么严重，也不管专家学者们提供的方略措施有多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却是大家都坚信不疑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本世纪中国所要攻克的一道难关！可以说有幸并有志参与的人们正在承担着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正如深圳大学校长蔡德麟教授在祝词中所期待的那样：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改革局面，如果没有好的作品问世，就是对历史的负债。

1995 年 7 月

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理论